

安希孟

# 从私塾与学校谈起

—

西式学校教育走向世界,而中国私塾和科举制度则早已灭亡。此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山西大学今日之规模,乃由西学专斋而来,中学专斋自行消亡,故山西大学的创始人应当是李提摩太,而不是岑春暄。而今中国人民大学却要办中学专斋——国学院,只是不知道这国学院如何分系科和专业设置,是不是学外语、外国史、外国经济学、外国哲学……?国学院的教师是否享有西式学术职称?学生是否有西式学位?今日世界列国教育都从西方教育模式而来,而不是从私塾发展而来,这可能是常识。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百草园,“我的乐园”,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要将我送到书塾里去。“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去罢”。总之,在鲁迅眼里,上私塾是受罚、受苦、受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读经进私塾乃是使人失去率真、朴野而进入僵化、桎梏、教条里去。可现在苏州某地一

位先生却又要将孩子们关到私塾里去。据报道,私塾这一古代教育机构——菊斋私塾——在苏州十梓街开张了。其墙上挂着孔子肖像,连计时的方法都是古代焚香计时,穿对襟长袍束带的“先生”(可能是站着喝酒)为孩子讲解古代经文。课程有蒙学、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完全和现实学校教学相脱节。可是童子们到哪儿去应试策对?书山断径、学海无船、科举绝望、阮囊欠满、女友少言、父母寡欢、婆婆不乐、公公多烦。名曰“现代”私塾,实即痛疽。我们应当高呼:“救救孩子!”

鲁迅反对读古书,乃因为他从古书中出来,深知旧式教育机构和古书的危害性,“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因为他洞知弊端,反戈一击方易制强敌于死地。他批评:“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他指出,主张读经者的本义是在“将人们做笨牛看”。他主张,青少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1925年,章士钊主张读经尊孔崇儒专经复古,鲁迅讽刺他是“阔”人,说“狭”人

[作者简介] 安希孟,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及宗教哲学教授

也跟着起哄。当时有人主张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他主张扑灭之。如今,三味书屋不见了,我们的大中小学却只能见到草坪绿地长青树藤和生机勃勃繁花盛开的百草园。

私塾,有人译作英语的 private school,这其实是不妥当的,只能相当于英语中的 family class,这和中国的家族制度有关。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石。私塾同外国的私立学校根本不同,私立学校对国立学校而言,它包括法人和教会的学校,其实不是由个人办的家庭教育。严格说来,传统中国的私塾译为西方的私立学校是不恰当的。在西方,私立学校是指:A school, owned and run by private individuals, not by the government, and usually charging fees for tuition, etc. An independent school supported wholly by the payment of fees. School supported by a private organization or private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by states.

笔者认为,中国的私塾与西方私立学校根本不同。私塾属私人办学,乃私学,是由塾师私设的学馆,也有属于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每个私塾只设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教材及教学年限没有规定,大概20岁已婚男子还可以在这里上学。私人设立的学校同公立学校

相对待而言。旧中国规定,凡私人或私法人设立的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及宗教团体设立的学校也是。解放后,中国学校大都由政府举办,一部分由人民群众集体办。文化大革命中的民办学校或民办教师(拿工分,分口粮,分萝卜)不是任何意义的私塾或塾师,因为他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针都得按政府要求办。私塾者,私家所设之塾也。有塾师自行设馆者,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课其弟子者,有于义庄或宗祠内设塾以课一姓子弟者,有专课贫寒子弟不收费者,种类颇多,内容尤杂。这可以看出中国族权势力之大和家族中心之炽。

这使笔者想到,中国古代的书院同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大不相同。西方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如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甚巨。中国的私人藏书楼甚至连本族女子也不能进去阅读。中国传统私人藏书,代不乏人。汉代刘向已发明图书分类之学。但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分类法没有诞生在中国,私人藏书对公共文化贡献甚微(例如杭州天一阁。有人把岳麓书院说成是现代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大学也因此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有一千多年的校史,比牛津还牛。但是这一说法不对)。清代教育当局深知国内经济之窘迫,不足以多设学校以应学龄儿童之需,乃于宣统二年改良私塾,这仍与私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

的创始须顺应于各种关于私立学校之规程,而在立案时尤须经教育当局认可。私立学校应受教育行政机构指导,应明确标示其名称,有校董、校董组织会。

笔者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塾是否符合中国的教育法,是否在教育当局备过案,是否使用国家规定的统一教材;其教师资格如何认定,教师的资质如何保证;其教育教学经费由何而来,我国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或免费教育,不知道这私塾经费收费如何解决;对学生的考核、升级、考量制度是否符合法规,也不知道这些学校的学生是否仍得接受公共学校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他们将来是否要参加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他们有否合法的经济来源,其师资与课程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学生的课程设置及考试如何解决,其所设课程为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没有珠算)是否与我国教育法规相抵触。如果学生白天上公立学校,晚上又进私塾,或竟然根本离开公立学校而单独享受私塾教育,那简直就是误人子弟,违反中国的教育法,应当取缔。

我国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乃法定公共教育,学生的教学管理、课程设置都纳入国家计划,教师由政府选派,是国家公职人员。苏州首家私塾是否经过登记注册?这里的教育主管部门忘记了教育法和教师法了吗?可以看出,这种私塾严重违反我国现行法规。据报道,为

了适应“蓬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需要,山东某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私塾蒙学教育教材。只是不知道这些教材是否经过国家教育部门审查?看来,私塾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趋势。这也适合当代国际趋势吗?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初等教育属公共教育、义务教育与公民教育。国家教育的最重要目的,是培养负责的公民。1905年,清朝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这与兴办现代学校是同步的。私塾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策试,中举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国早已废除封建制度,按苏州私塾创办人的观念,他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登天子堂,可到哪儿去登?我们要培养与世界教育接轨(也就是与西方教育接轨)的人才,私塾肯定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今天的大学动不动就和西方的大学相比较。我们的中学生志存高远,做梦也想着出国或到外国公司工作。让他们读四书五经,进私立学堂,肯定和这目标相违背。大人们不要误人子弟。倒是另外一则消息使人振奋:中国有十所小学开始使用美国教材,简称STC(面向儿童的科学和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Children),包括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和技术科学,它包含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它注重培养学生观察实验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培

养“十”字型人才。它贯穿的是素质教育,具有先进性、科学性、适用性。

## 二

我国废除科举制度已一百年。可最近有人说,真正评价科举制度,还需要一百年。难道一百年之后要恢复科举制度吗?有人说:“科举制度对加强社会安定,民族联合,巩固国家政权和统一,促进社会流动,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对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1905年光绪帝下诏废止存在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这是亘古之奇变。可是有人说,一种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说明它有优越性。有人说,科举曾经是选拔人才的方法(然而科举是选拔官吏而不是选用科技文学艺术人才),说科举内容不是脱离实际(学术研究变成胡说)。陈清泉列举了盛宣怀出的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题目本身正是逆科举之潮流。这是欧风美雨的产物。张謇,状元郎,实业家,他的科学肯定不是在科场学到的(这些例证是陈清泉先生引用的)。然而,停滞僵化,谈不到优越。缠小脚,娶小老婆,买卖儿童,有一千年历史,但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锁在闺中的女子,刺绣不错,但我们用不着颂扬封建制度。“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须知,科举制度只是选任官吏。

20世纪的普遍认识是: 科举诱导

士子,理学束缚人心。科举与八股一体,都是为了牢笼人心,役使天下万民,严密监视思想。科举主要不是培养学者,而是选任官吏。学官一体,干部知识化,入仕为官成为唯一出路。科举因而叫做 Imperial examination。近代反对科举的人认为,科举不废,社会痼疾难除。科举乃国家大典,结果,造做空疏,揣摩抄袭,养成士子利禄之心。我们的翻案史学,也不能这样来搞。

我们的学者们真是让人如堕五里雾中。笔者怀疑,兴办私塾,祭祀孔子,鼓吹繁体字,恢复科举制,可能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我国目前还有不少贫困地区农家子弟失学,危房、无房学校山区所在多有。可我们有些人却花国费公帑,在国外办了100所孔子学院。这得花多少钱哪?为什么不办几百所山区贫困生学校、民工子弟学校、残疾人子弟学校?须知,我们的教育经费在列国按倒数计。孔子学院和基督教神学院、天主教修道院、伊斯兰教经学院、佛教的佛学院一样,应当由孔门弟子或儒生或宗教团体去办,不应当由国家来办,因为我们不是孔教立国,不是儒学治国。不知道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是否有现代西方科技和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他们的学子们要向孔子行礼如仪吗?

现在国内祭孔,连不出名的弟子燕伋也沾光。陕西千阳县一千余师生集会

弘扬他的精神。2005年全球举行联合大祭孔活动。据说这也是为了“和谐社会”。2004年9月28日曲阜祭孔，人员杂沓，乱成一团，太监司仪，鼓乐齐鸣，文官一品，白鹤补服，猪头倒置，三牲上供，牛尾猪臀，正对孔子。这位当年的“反动思想家”，而今竟成了圣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10月7日报道：十一长假，中国各地汉服倡导者云集北京举办霓裳恋“汉服”知识大赛：天子临朝装，官员出班装，阔人太太装，文人商贾装，富家小姐装，汉官威仪装，军旅武士装，兵勇马甲装，读书童生装。交领右衽，峨冠龙袍，宽袖博带，长裙拖地，高簪入云，小脚绑腿，细腰束胸，长靴木屐，是真正汉服也。然而，清朝以前，汉服与外来服装已经相互融合，赵武灵王推行圆领窄袖，是中国服装史上第一次融合。辛亥革命改为中山装。喜欢在服装上讲阶级斗争的人，也喜欢在服装上鼓动民族主义情绪。

我们的文化浮躁表现在各个方面：第22届洛阳牡丹节，三万余市民在太极拳五大掌门人带动下齐练太极，创吉尼斯世界大全记录。然而，整个洛阳太极气功习练者实际上并不到三千人。劳民伤财，政府强拉硬派。甘肃天水建中华始祖园，有先贤园、药王园，发扬财神文化与药王文化。据说伏羲氏生在甘肃天水。这种好走极端的思维方式最终发展

为“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缠小脚、娶小老婆、闯红灯、随地吐痰、说粗话、随地大小便、校园养狗，都会成为世界的。2005年我国有好几个省市争当舜帝故乡，《山西日报》专家河东论虞舜，山西运城要同冀州、兖州一争高下。“舜德巍巍天下扬，众心穆穆祭圣灵”，提倡以德化民，施政以仁，反对现代法制。有两省市争当诸葛亮的隐居地。这都是文化保守主义大抬头。2005年8月，文化保守主义者啸聚武夷山，举办“武夷论道”，蒋庆主张将儒教定为国教，指导我们的思想。他们主张公祭孔子，公祭黄帝。山西大学的刘毓庆先生主张以孔子学说拯救世界，好像世界要毁灭了。

有人为旧历年即农历年招魂，但我们现在记忆农历年春节的办法以及记忆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的办法仍然是以公历为准，按公历日子过农历节。我们根本不可能脱离公历而单独使用农历节期。我的老姑80岁的时候还能在黑暗的窑洞里纺棉花，并且清楚地记得农历的节期和日子。可是现在的人不同了，离开了公历，没有人能单独掌握农历。

现在中国风水又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风水的赞美行列中。乡村神汉巫婆招摇过市，风水网站风靡中小学，教育局长为提高升学率请人看风水，县委办公大楼则请风水先生看地势

和选择动工吉日。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公然说风水文化历久弥新。南京大学一教授认为风水师应当有高级学术职称。

### 三

有人鼓吹法国人也像中国人维护汉语抵制英语那样鼓吹法语抵制英语。20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曾企图完全废除英语术语。但是,宪法委员会的裁决却否定了这种禁止,因为他们考虑到法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是:法语中有丰富的英语词汇。在今天,你只要在巴黎或任何一个法国城市走一圈,就会发现大量的英语术语或表达法。在进口美国文化的每一个地方,英语的影响都显而易见。英语的生命力表现为它的新词汇不断增长。有一种说法,说英语是一种相对而言可以说得比较糟糕的语言,说英语的人会容忍别人对其语言的糟糕的用法。现在中国有一班老人动不动就纠正青年的语言不规范。他们要维护旧的语法规则和词法。其实规范与不规范是相对的,规范是从不规范来的,有不规范才有语言的发展。容忍可以把中文说得很糟糕,才能避免中文不糟糕。也有人引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暗示中文或汉语到了最危险的“最后一课”,应当像法国人抵制德语那样抵制英语。但英语现在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

语言,而是世界性的语言。《最后一课》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包含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我们更不能引喻失义,谈论汉语的危机——学习外语是我们的自觉要求和教育部门的决定,是国荣,并非亡国之痛之耻。下面是一段网上聊天对汉语的“糟蹋”:

GG: 你嚎(好)! MM: 你嚎! 你在哪里? GG: 我在王八(网吧)里。你呢? MM: 我也在王八里。GG: 你是哪里人? MM: 我是鬼(贵)州人。你呢? GG: 我是山洞(山东)人。MM: 你似(是)男似女? GG: 我当然似难(男)生了。你肯定似女生吧? MM: 是啊。GG: 你霉不霉(美不美)? MM: 还行吧,人家都说我是大霉女。你衰不衰(帅不帅)? GG: 还好啊,很多人都说我是大衰哥。MM: 真的呀?咱们多怜惜(联系)好不好? GG: 好呀。

笑话就当作笑话,不要太当真,更不要忧心如焚。

也有人批评现在大学生的文章,“但那口气真可7456。所以偶才说他是恐龙。”不喜欢对老师PMP。”这种批评可以说是杞人忧天。最近有个笑话,也反映外语(英语)进入人们交流中的日常词汇:哪家银行缩写最牛?

中国建设银行(CBC):“存不存?”  
中国银行(BC):“不存!”中国农业银行

(ABC):“啊,不存!”中国工商银行(ICBC):“爱存不存!”招行(CMBC):“存吗?白痴!”兴业银行(CIB):“存一百。”国家开发银行(CDB):“存点吧!”北京市商业银行(BCCB):“白存,存不?”汇丰银行(HSBC):“还是不存?”

对 foreign 词汇和字母以及商标、招牌、外文广告进入中国,我们应当谈笑风生、乐观其成,以平常心对待之,而不应当忧心忡忡,似乎神州要陆沉,天要塌下来。青年人说两句外语,电视节目中说两句英语,都没有什么可怕的。资本主义不会复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外来语越来越多了,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比如下面几句话就很正常:“昨晚的开场是由Rain的师妹Star拉开的。”Twins和英皇的同门师妹Boyz一起表演了《王子与公主》。”歌迷高喊JJ的名字,更一度拉着JJ的衣领想要献吻。”有深受广大学生欢迎的《I Can》。”

外国人学汉语,不能说明汉语会统一天下。在他们,这是胸怀宽广的表示。有消息说:美国人学中文,是因为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力与日俱增。与其想着对方是竞争对手,倒不如准备和他们打交道,这是更聪明的做法。

中国一些学者鼓吹汉语统一天下,徒然授人以柄,给人以“中国威胁论”的根据。现在有所谓考“土托福”说,即汉

语水平考试。这完全是瞎折腾。然而,我们知道,攀登科学高峰,进军诺贝尔奖,你必须以英文写作并发表科技论文,也必须大量参考英文或其他外文文献,没听说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世界级大师必须精通中文或参阅中文文献。这和中国获科技大奖的成果必须是汉语作品或论文而不能仅仅用藏文或蒙语发表一样。中国人推广普通话而不是用粤语、沪语或方言播新闻。我们没有中文GRE。汉语的“土托福”肯定达不到英语的托福水平。考汉语“土托福”的人,并不是为了科研或得到高级学位,而是为了到中国教英语或经商生存——能乘公交车或用餐如厕即可。外国来华经商者的汉语水平肯定不如负笈西洋攻读博士的华人的英语水平高。外国人入中国,也没有中国人入美国的多。这是事实。事实有时使人伤心。我们千万不要听信一些胡言乱语者关于削弱英语教学的聒噪。

今天,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这可能用不着争论。在朝鲜平壤国际机场,有醒目的英文“平壤”二字。据中央电视台批评,首都机场“紧急出口”处(Emergency, or, Safety Exit)英语标志错写为:No Entry on Peacetime。“小心滑倒”错为:Don't Fall Down。现在有人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企图动摇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反对四六级英语

考试,反对研究生学习英语。也有人说汉语将统治世界。此志可贺,此言极差。我们不要忘记,电影奥斯卡金象奖需要英文配音,诺贝尔文学奖应当有英语译本,西哈努克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以及灾民与难民说的是英语。最近又听说汉语是全人类的汉语,是人类文明历史最伟大、最独特的结晶。可是“他妈的”就不见得好了。这里我们又看到“最最最最”。但是最独特的,未必是最好的——比如鲁迅说的,你脸上有个疮,人无我有,就一定好吗?说“汉语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这思维方法肯定不对。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比较出来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不错,但是这并非说,汉语是存在的家。不少人已经离开汉语。但他们的家更好了。我们的学术术语中很多概念范畴就是外来语。有人说些似是而非的话:“失去了中国人的基点,你什么也不是。”这话有些模棱两可。然而,失去了人的共性和人权,你就什么也不是呀!有人说自己是汉语的崇拜者,说他感谢汉语的保守性,这就有些文化革命的造作极端的特色了。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先生反对“捍卫母语的纯洁性”,批评“反对夹杂外来语”之举。有人说法国的卢浮宫没有英文说明,只有法文说明。可这种说法本身不就是抬举外国的法国人吗?作者自己犯了“以西

方的眼光批评中国”的错误。杭州西湖有英文日文标志,赚了外汇,也很好。杨叔子说人文是民族的身份证,这话很费解。但我认为我们的身份证是人性、人性和人道。有人把英语看作汉语的克星。但是在美国学习的薛涌先生却认为汉语如果不对外开放,就会变成语言化石。他认为,汉语世界的文化创造力太差,中文可看的东西太少。这话可能使我们泄气。不过我认为没关系:人类毕竟还有别语言。他认为,从形式看,汉语是象形文字,引入外来词语有不少困难。中文的危机是自身的。我也可以说,这危机是自生的。

据《世界报》报道:中国大陆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不如印度。中国大陆2005年有330万大学毕业生,是美国的2.4倍,但能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只有10%(33万),比印度大学毕业生的25%低了一大截。我们应当急起直追。■

注释:

载《现代金报》2005年11月2日、《羊城晚报》2005年11月。

陈清泉:“为科举说几句公道话”,杨齐福:“科举考试制度的再审视”,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5日。

史占旗:“我怎么看不懂报纸了”,载《监察日报》2005年11月18日。

李献伟:“此事不关英语”,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



安希孟,男,一九四五年农历九月十五日生于山西翼城县东南一隅一破窑洞中,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是一首旋律动人的好诗,生肖乃一会报晓但将来要挨一刀的雄鸡!后来不幸成为山西大学哲学系混饭教授书痴文士刀笔吏幼导小导中导专导本导。祖上是农民世家,可能来自波斯,或北疆胡人,并非异禀之人。父母唯知柴、米、油、盐、酱、醋、茶。父亲善打算盘,曾在棉花收购站算账,母亲酿得一手好醋。父亲参加过人民解放军,但晋南平原农民留恋家庭,离队弃枪逃逸回家。我自幼智力鲁钝,一贯不是好学生,才智中庸,成绩平平,上课爱提怪问题且常有违规情事发生,额头上没有异人之相。

“文革”中喜夤夜看大字报。这种文字争论修辞章法的熏染,使我喜欢在用“字”上下功夫,讨厌不通顺、不优雅、自造术语的断烂朝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一九六九年毕业。一九八二年获南京大学基督教研究哲学硕士。喜欢咬死理,较真格、挑字眼,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感而发,嬉笑怒骂,我自横笔对己笑,去留肝胆两勺炒,赤条条来去自由无牵挂,管他博导院士模范先锋纷乱如麻小人得志头戴乌纱我方登台你已唱罢。

现为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研究教授,发表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研究论文以及译著百余万字以及关注社会的闲杂文章多篇,尤以在《社会科学论坛》和河北作协《文论报》上的文章独抒心机。在山西大学执教凡二十余年,讲授现代西方哲学和宗教哲学,但又不愿做书斋式学者,心忧天下苍生,然终不过是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而已。

范泓,男,广东潮州人。1955年生于南京。15岁时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返城后做过工人,当过公司宣传干事,并从事文学创作,多次获奖,系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后在新闻单位工作至今。

2000年以来,在《书屋》《随笔》《老照片》《社会科学论坛》《温故》《大学人文》《粤海风》《传记文学》(台湾)《中国读书评论》《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文汇报》《文汇报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40余万字,作品多次被《作家文摘》《报刊文摘》《读书文摘》《律师文摘》《历史教学》等报刊转载,并入选《2004年人文中国》《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人物印象》《2005年中国随笔年选》等多种选本,著有《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与李教打官司》《乱局之中民国从政学人个案考察》(待出版)等。